

中国史论集

Analects of Chinese History

(下)

王继平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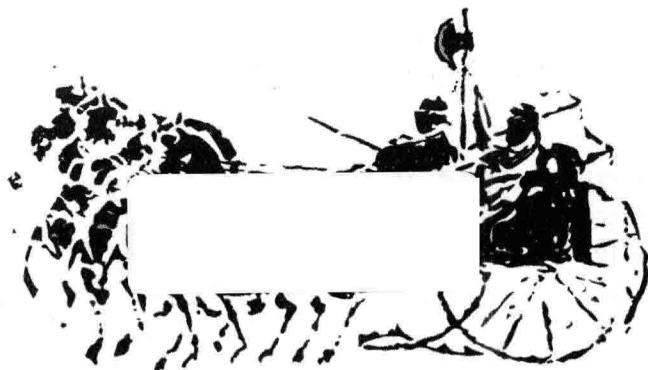
湘潭大学出版社

中国史论集

Anasects of Chinese History

(下)

王继平 主编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论集：全3册 / 王继平著.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81128-562-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历史—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8389 号

责任编辑：朱春花

封面设计：刘扬

出版发行：湘潭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电话(传真): 0731-58298966 0731-58298960

邮 编：411105

网 址：<http://press.xtu.edu.cn/>

印 刷：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25.75

字 数：2224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28-562-8

定 价：198.00 元(全书共三册)

(版权所有 严禁翻印)

CONTENTS

目
录

论洪秀全宗教政治思想的形成	谢起章 (1)
论洪仁玕的“防意盛惑”思想	谢起章 (9)
评孙中山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因素及其主要缺陷	谢起章 (17)
《陈洁如回忆录》史料价值质疑	谢起章 (28)
试论蔡和森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谢起章 (34)
邓小平人民群众观初探	谢起章 (43)
论清末两大主流思潮及其相互关系	郭汉民 (52)
洋务思潮的兴起及其基本主张	郭汉民 (81)
严复自由观再探讨	郭汉民 (100)
早期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异同论	郭汉民 (119)
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述论	郭汉民 (129)

太平天国与晚清政治	郭汉民	(141)	
五四时期湖南新文化运动述评	彭秀珍	(155)	
论清末湖南新式教育的兴起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彭秀珍	(165)	
论向警予由教育救国论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复杂原因	彭秀珍	(172)	
本世纪二十年代湖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原因探析	彭秀珍	(180)	
浅析陈独秀转向托派的原因	彭秀珍	(186)	
试述抗战时期我国中间党派的政治态度与贡献	彭秀珍	(193)	
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演变	刘昭豪	(202)	
重评陶德曼调停	刘昭豪	(213)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思想	刘昭豪	(222)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	刘昭豪	(233)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构成及其性质和特点	刘昭豪	(242)	
中流砥柱筑长城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的活动	刘昭豪	(251)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策略	刘昭豪	张清绪 (257)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孙中山与李大钊			
——纪念第一次国共合作六十周年	刘昭豪	陈建成	廖忠让 (265)
延安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上的创见	刘昭豪	(273)	
百团大战是国共合作的典范	刘昭豪	(278)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述评	徐平中	(285)	
关于平江起义的几个问题	吴家丕	夏光暹	徐平中 (295)
彭德怀在湘军中的轶事	徐平中	夏光暹	吴家丕 (307)
彭德怀参加北伐的岁月	徐平中	夏光暹	(315)
彭德怀在南县	徐平中	夏光暹	(324)
彭德怀童、少年的遭遇	徐平中	夏光暹	吴家丕 (332)
刘少奇同志在安源路矿达成的十三条协议是维护工人利益的			
.....	宋兴祥	(340)	
关于湖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	宋兴祥	(347)	

试论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的原因	钟启河	(354)
1944 年的衡阳保卫战述评	钟启河	(362)
第一次长沙会战述评	钟启河 姜海湖	(368)
左宗棠与台湾 ——开发保卫台湾的历史贡献	钟启河	(376)
湖南海外华人华侨的形成发展过程	钟启河	(39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阁的演变	杨昌宴	(405)
重评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策	刘松茂	(413)
试论邓小平的多党合作思想	刘松茂	(419)
论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若干特点	刘松茂	(428)
论毛泽东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分析与党建理论的创新	刘松茂	(436)
论解放战争时期资产阶级中间路线的历史作用	刘松茂	(444)
试论毛泽东对劳动者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探索	刘松茂	(451)
论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历史依据	刘松茂	(461)
新发现的彭德怀的一封信	刘松茂 许 敏	(467)
南昌起义与统一战线	刘松茂	(471)
任弼时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工作战略思想研究	黄灵辉 刘松茂	(479)
瞿秋白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足迹	杨秀春 刘松茂	(483)
论章乃器的货币金融理论	刘松茂 杨秀春	(492)
论汪精卫与吴佩孚对日寇诱降的不同态度及其原因	刘松茂	(499)
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几个问题	刘松茂	(508)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试论毛泽东个人特质与中国革命特点的契合	刘松茂	(515)
李富春与国民经济调整的起步	刘松茂	(525)
抗战时期的讨汪反投降运动	刘松茂 唐正芒	(534)
略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讨汪运动	刘松茂 唐正芒	(537)
李富春和国家计委的改组	刘松茂	(544)
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问题的探索	刘松茂 蒲红华	(554)

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应该制度化法律化

——发展多党派合作制度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	吴家丕	刘松茂	(562)
毛泽东的多党合作思想初探	刘松茂	郭文亮	(570)
试论江泽民对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问题的理论贡献	蒲红华	刘松茂	(579)
湘籍革命家群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雷国珍	刘松茂	(586)
周佛海叛党原因浅析	刘松茂	余 湘	(595)
中国国民党改组派述评	刘松茂		(603)
略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军事战略方针的形成	刘松茂		(610)
血洒抗日沙场 筑就历史丰碑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刘松茂		(616)

论洪秀全宗教政治思想的形成

谢起章*

洪秀全在创立太平天国革命理论时，一方面借助由西方传入的基督教的语言，来表达农民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使他的政治理论披上一层宗教的外衣；另一方面又按照农民革命的需要，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某些改造，使他的宗教思想具有革命的、政治性的内容。因此，在他的政治思想中，政治理论和宗教观点紧密相连，冶于一炉，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这就是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表现。

洪秀全宗教政治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萌芽、确立和成熟三个阶段。

1837年洪秀全的“异梦”（即“丁酉升天”故事），是他的宗教政治思想开始萌芽的重要标志。梦幻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要正确说明洪秀全“异梦”的来源，则自然要联系到他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情形：“1833年洪秀全在广州应试，第一天在街上曾遇到一个算命卜卦者，第二天再去找那人，却意外地遇到梁阿发，此人是本地传教士，乃伦敦圣经会（London Bible Society）雇的专为分散《圣经》给来广州赶考的青年的。洪秀全后来说，这个大袖子、长胡子的人很可敬，秀全自他手中不花分文得到一部宗教的并有箴言的题为《劝世良言》的书。他把这部书带回家去阅读，但未能完全了解其新意，并对一些神学名词与句子甚至难懂。于是便置于书架之上，一直有十余年未动。但终于自此已撒下了种子，由滋长而结果实了”。^① 尽管洪秀全当时在阅读《劝世良言》时“未能完全了解其新意”，并对一些神学的名词与句子感到“难

* 谢起章，男，1938年出。196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先后在高中和大学任教。1984年调入湘潭大学，先后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马列部副主任、法学院副院长。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著有《陈洁如是蒋介石夫人吗？》，编撰《中国革命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

① 转引自彭泽益：《洪秀全得〈劝世良言〉考证——兼论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68页。

懂”，但此书教人当信上帝、从耶稣、守十诫，而勿拜邪神的基本内容，则给洪秀全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因此，“其后洪氏在病中得见幻象，于其中彼得受教训与此书所言之道相符”。^① 这说明洪秀全早在 1833 年已经开始接触基督教。有的同志认为，洪秀全是在 1843 年最后一次应试落第以后，阅读了梁阿发的《劝世良言》，才开始接触基督教的。^② 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1837 年，洪秀全又一次赴广州应试。“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在悲苦失意之中，秀全又复得病……阴历三月初一日回到家中，病势甚为沉重，卧床多日。”“在此卧病期间，彼连续入奇梦，见异象多次。”^③ 此乃洪秀全“异梦”。“异梦”的基本内容和情节是：丁酉岁（1837），天父（上帝）遣天使接洪秀全的灵魂升天，指明妖魔作怪，迷惑世间情形，并赐玺、剑，命天兄救世主耶稣（上帝之子）统带天兵天将，助秀全战胜无数妖魔。战胜回天，天父复差秀全下凡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救援天下人民，并嘱谕勿愧，放胆为之；凡有烦难，有天父做主，天兄担当。^④

我们从“异梦”的内容与情节中可以看出：（一）当时洪秀全的思想中确实已经有了关于上帝（天父）和救世主耶稣（天兄）等观念，并开始萌发了敬拜上帝的宗教意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将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这是自从我的灵魂被接上天后之心中大愿也。”^⑤（二）“异梦”中关于天父赐秀全以玺、剑，让他去战逐妖魔，复差他下凡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救援天下人民等情节，以及他在卧病时“一连四十多日，所言所行，都言打江山，杀妖魔的话”。^⑥ 这些都说明，当时洪秀全的思想里已经有了天王意识和“打江山”的闪念，反映了他愤世救民的政治思想。

但是，必须指出，在这个阶段中洪秀全的思想主流，乃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追求仕途、热衷功名的科举致仕思想。他的宗教政治思想当时尚处在孕育过程和萌芽阶段，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这是因为：第一，洪秀全虽然屡试不中，不免感到“悲苦失意”，但他并没有最后抛弃登科致仕的幻想，依然“尚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 822 页。

②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 8 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 840 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 364 ~ 365 页

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 854 页。

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 848 页。

醉心科举之虚荣”^①；第二，他对“异梦”的真确性尚未得到证实。他还没有将《劝世良言》的内容与“异梦”的情形相印证。他说：“如我徒得此书而无前时之病状，则断不敢信书中所言而反对世上之陋俗。然而若徒有前时之病而无此书，则又不能再次证实吾病中所历之为真确，亦不过视为病狂时幻想的结果而已。”^②这种情况正反映了洪秀全早期思想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科考失败的刺激，是促使他确立宗教政治思想的动力。这一年洪秀全又一次赴广州应试，结果还是名落孙山。这使他“深感绝望，发现研读孔子不再是获取功名的途径”。^③现实与理想的背离，导致他精神苦闷和心理失衡，而科场失意的沉痛教训，又使他对科举制度产生不满与怀疑。于是，他决心绝意科场，彻底抛弃登科致仕的幻想，并由此产生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怀疑，进而产生叛逆现存制度的思想。

细读《劝世良言》后的大觉大悟，是洪秀全宗教政治思想开始确立的标志。正当他科场失意、彷徨苦闷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潜心细读”了闲置在书柜十余年之后的《劝世良言》。读后“遂大觉大悟，于此书中寻得解释其六年前病中梦兆之关键，觉书中所言与其梦中所见所闻相符之处甚多”。^④有此相符之故，遂令其确信梦象与全书均为真理，而彼自己确为上帝所特派以拯救天下——即是中国——使回到敬拜真神上帝之路者”。^⑤此时，他的天王意识进一步增强，他“反对世上之陋俗”的决心也更大了。他说：“我曾在上帝之前亲自接受其命令，天命归予。纵使将来遇灾劫，有困难，我也决心去干。”^⑥以上史实说明，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此时已真正确立。

《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是研究洪秀全宗教政治思想确立过程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原道救世歌》约写于1845年，即洪秀全由广西传教返回广东家乡所撰。^⑦这篇用诗歌形式写成的布道作品，其基本思想是向人们宣传要敬拜上帝，勿拜邪神，须作正人的道理。它具体阐明了以下几个观点，即：（一）上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58页。

^③ 转引自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1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46页。

^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48页。

^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48页。

^⑦ 据《太平天日》载：“主（洪秀成）回东后，年三十三，岁在乙巳，作《原道救世诏》。”（按：“诏”即歌也。）

帝是独一真神。它造化五行万物，赐给人类衣着、饮食，具有无限权能和恩德。（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上帝人人所共，天下实即一家；“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是自古已有之事。所以，无论贵贱，不论君臣，“上帝当拜，人人所同”。^①（三）“不正天所恶，能正天所亲”。全篇用大量史实揭露和抨击了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六不正”（即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窃、为巫觋、为赌博等现象），并具体提出了“正道”的典范。

《原道醒世训》约写于1845—1846年间。这篇作品的中心思想，是要把陵夺斗杀之世改造为公平正直之世。它反映了洪秀全美好的社会理想。首先，他在这篇作品中对现实社会作了更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今日”的社会是一个非常黑暗、极不合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国与国、省与省、府与府、县与县、乡与乡、里与里、姓与姓之间“相陵相夺相斗相杀”。因此，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必须进行拯救和改造。其次，他依据儒家的大同理想，初步提出了一个关于“万国一家”、“天下为公”的太平之世的构想。再次，他还根据“乱极则治，暗极则光”的哲理，明确指出“于今夜退而日升矣”，坚信太平之世定能实现。他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②，去实现这个社会理想。

我们如果将这两篇作品做个比较，即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在思想深度上显然前进了一步，它不仅更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而且还构想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但是，这两篇作品都偏重于宗教和道德的说教，把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指引为“正己”、“量宽”、“和为贵”、“各自相安”等个人身心道德的修养，企图以此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改造。

与此同时，随着鸦片战争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人民群众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不断高涨，洪秀全思想中早已萌发的天王意识也越来越明朗化了。“从这个时候以来，洪秀全心中似乎在一种模糊状态下时时想起来一个念头，即他在青年时代的爱国幻想可能有一个实现的机会”。^③他援引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赋诗言志：“五百年临真日出，那般爝火敢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87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92页。

^③ 迪乐：《中国人及其革命》（T. T.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1856年版，第87页。

争光……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耀万方。”^①诗中“五百年临真日出”一句，乃暗喻他自己是授命于“天父”的“太平真主”。而从明朝的朱元璋到清代的洪秀全正好相距五百年左右。因此，他作为“真主”出现是合乎时运的。我们从这首诗的意境中可以看出，洪秀全此时的天王意识已是昭然若揭了。

洪秀全天王意识增强的结果，则必然发展为反清思想。他自1843年科考失败之后，就多发排满之语。^②“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予（洪仁玕——引者注）问其故……则谓弟生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兴言及此，未尝不拍案三叹也。”^③以后，他又对洪仁玕“告以中心之秘密思想及其对于满洲人之仇恨”。他说：“上帝划分世上各国，以洋海为界，犹如父亲分家于儿辈，各人当尊重父亲之遗嘱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产业。奈何满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国而强夺其兄弟之产耶？”^④可见，洪秀全此时已经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清朝统治者。

但是，洪秀全这个时期的反清思想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它既没有同农民群众的实际斗争相结合，也没有同暴力革命思想和创立新朝的实践相连系。他一直幻想通过人们身心道德的修养，来改变江河日下的世风，进而改造整个社会。这种反清思想还仅仅停留在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上，尚未发展成为革命反清的思想。

1847年春，洪秀全为了“学习圣道”还曾同洪仁玕一道来到广州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在此“一住数月，背诵圣经”。^⑤只是由于他要求受洗的愿望未能满足，才愤然离去。

可见，当时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虽已确立，但并没有完全成熟，他在这个阶段的思想主流乃是敬拜上帝的宗教思想。他此时主要还是个宗教家。如果没有业已成熟的革命时机，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推动，他还很难毅然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54页。

^②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第19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570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53~854页。

^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22页。

1847年夏，洪秀全第二次入桂。他这次入桂的目的本是为了“宣传上帝真理”，但当他到达桂平紫荆山与冯云山会面后，他的思想迅速发生了变化。引起他思想巨变的主要原因，则是由于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推动。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①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内外矛盾极其尖锐。一是人民群众反侵略的斗争方兴未艾，特别是广州人民反抗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并波及洪秀全的家乡花县境内，这必然使他受到很大震动；二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也日趋激化。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彼伏此起。“自直隶、山东、河南及浙江、两湖等省，劫案迭出，几乎无处不然，而最多且甚者，莫如两粤。”^②尤其是当时的广西，它成为内外矛盾最集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地区。“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③当时有人形容：“粤西（广西）近日情势，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终必有溃败不可收拾之一日。”^④而当时拜上帝会最活跃的紫荆山地区阶级斗争的形势更为紧张、剧烈。农民起义“滋扰无虚日，官军屡击不利”。^⑤洪秀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了紫荆山，他的宗教政治思想也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趋于成熟的。

洪秀全于1847年八月来到紫荆山以后，亲眼看到了拜上帝会迅速发展的有利形势，又了解到紫荆山地区“每村每处，皆悉有洪先生而已。到处人人恭敬”。^⑥这使他受到很大鼓舞。于是“居月余”他就同“前做事者”与“谋立创国者”冯云山等“写奏章，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⑦开始利用拜上帝会来秘密开展革命活动。首先，为了启发群众的觉悟，使“人多明醒”，他“每天同南王（冯云山）写书送人”，让“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速，及于广西数县地方”。^⑧其次，为了扩大拜上帝会的影响和提高它的声威，他还于1847年10月亲率冯云山等人前往象州捣毁了“甚灵”

^① 思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1959年版，第469页。

^② 丁长仁等纂：宣统《番禺续县志》卷19，第17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88页。

^④ 龙启瑞：《经德堂文集》第6卷。

^⑤ 谭熙龄：《桂平历年群盗事迹》，同治《浔州府志》卷27。

^⑥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88页。

^⑦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648页。

^⑧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VI，第858页。

的甘王庙。随后，拜上帝会会众也到处毁坏许多偶像。其结果，一是破除了农民群众对鬼神的迷信和畏惧，使他们从封建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迅速走向反抗封建压迫的革命道路。所以，“此事发生后，秀全声誉大起，信徒之数加增更速”。^① 二是猛烈冲击了封建鬼神系统，因此激起了那些依靠鬼神系统来维护其统治的土豪劣绅的疯狂报复。这样便使宗教斗争迅速转变为政治斗争。

1848年1月，冯云山、卢六被捕入狱事件，是宗教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契机。

“冯、卢事件”发生后，洪秀全为营救冯云山而回到了广东。1848年10月，冯云山出狱（卢六死于狱中）。1849年7月，洪秀全和冯云山重返紫荆山。这时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的斗争十分激烈。“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② 同时，三合会和其他群众的反抗斗争也很频繁，尤其是土籍人和客家人的械斗则更加厉害。因此，一些被打散的三合会群众和客家人为了求保护，都纷纷投奔拜上帝会。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则必然导致拜上帝会与官府的直接冲突。洪秀全“明慧的眼光早见及此”，他“早已预定计划，准备应付方略”，决心以“明主”、“汉皇”为榜样，发动和领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③

此时拜上帝会的活动，无论其内容或形式，都跟组织和发动反清武装起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斗争。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就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趋于成熟的。

《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这两篇作品，是洪秀全宗教政治思想趋于成熟的主要标志。

《原道觉世训》约写于1847—1848年间。它的中心思想是批判“阎罗妖注生死邪说”，进一步阐明要拜上帝，勿拜邪神的道理，同时，还揭露了历代君王僭号侵权的罪过。全篇突出了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它反复论证了皇上帝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真神，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而阎罗妖则是老蛇妖鬼。所谓“阎罗妖注生死”，乃是害累世人的“怪诞邪说”，是历代君王提倡效尤的结果。^④ 在这篇作品中，皇上帝已经由一个劝人忍耐、顺从、不要革命的仁慈上帝，而变成了一个护佑人们放胆诛妖的革命上帝。全篇充满了战斗气息。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60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88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69页。

^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93页。

《太平天日》是记叙太平天国开国前历史的一部充满神话色彩、且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作品。此书虽迟至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才“遵旨”颁行，但早在戊申年（1848）冬就已“诏明”，很可能是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于同年在花县家居时所共同创作的一部著作，至少可以反映洪秀全当时的思想动向。书中所记起于1837年洪秀全“丁酉升天”故事，讫于1847年洪秀全、冯云山等人赴象州捣毁甘王庙之举。其中还包括洪秀全细读《劝世良言》后确立拜上帝思想之经过和两次出游广西之情形。作者通过对一些史迹进行神话般叙述，着重阐明两个问题：一是宣扬洪秀全是奉天诛妖的“真命天子”。作者用很大篇幅描述了一个关于洪秀全升天受命，被天父封为“太平真主”，下凡救援天下人民的神话故事，其目的就在于赋予洪秀全以“真命天子”的灵光和奉天诛妖的权威，以此来提高他的领袖地位和增强他对农民群众的号召力。二是强调“斩邪留正”。这是以皇上帝同阎罗妖的尖锐对立为前提而提出的一个战斗口号，它反映了农民群众决心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朝黑暗统治的革命意志和要求，同时也说明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至此已经完全成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洪秀全宗教政治思想的形成，并不是“受天命之指导”，或者是“由一种宗教观念而产生”，而是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中国人民反压迫、反侵略斗争的经验总结。

（原载《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论洪仁玕的“防意胜惑”思想

谢起章

太平天国自“天京事变”后，革命形势发生逆转。政治上“大纲紊乱”、“事权不一”；军事上“进寸退尺”，“锐气减半”；思想上信仰动摇，“人心冷落”。其时受命于危难之际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为“力挽人心以维世道”，特撰写了《克敌诱惑论》一文，提出了“防意如防城”、“胜惑即胜敌”的思想主张（以下简称“防意胜惑”思想）。所谓“防意”，就是要防止地主阶级意识对革命队伍的侵蚀；所谓“胜惑”，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抵制和战胜封建腐朽思想对人们的诱惑。洪仁玕将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防意”、“胜惑”，同军事上的“防城”、“胜敌”等同对待，高度重视，这在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尚属首创。他的“防意胜惑”思想，不仅对后期太平天国收拾世道人心、稳定政局，产生过积极影响，就是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颇具历史借鉴作用。

—

洪仁玕的“防意胜惑”思想，是太平天国一向重视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现。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①早在太平天国的酝酿和发动时期，洪秀全就利用西方传来的基督教创立了拜上帝会。他借用宗教语言、宗教信仰来“化醒”世人，团结群众，鼓

^①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见《红旗》杂志1967年第9期。

舞斗志，“蓄万心如一心”，以掀起巨大的革命风暴，去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金田起义后，在由金田到南京的革命征途中，太平天国十分重视对革命将士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天王洪秀全发布了一系列诏令，告诫通军大小兵将：要坚信天父真道，“各宜真草坚草耐草（草即心—引者注）”^①，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要遵天条，警惕“妖魔多端诱惑”，“叛爷惑鬼”，差入鬼路；要放胆诛妖，不要贪生怕死，贪安怕苦^②；要同心合力，“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③同时，太平天国还创造了“讲道理”这样一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形式。所谓“讲道理”，乃集众训话，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他们除平时举行礼拜要“讲道理”外，还有临时动员群众，或有重大举动，如临时受令、仓促行军、处决罪犯、鼓励群众去从事艰辛工作等，都必“讲道理”。^④而且，东王杨秀清还命令侯相专门撰写了《天情道理书》，作为“以天情真道化醒世人”的教科书。^⑤

太平天国除重视对革命队伍和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外，还对阻碍革命的封建迷信和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洪秀全依据基督教只拜“独一真神”，排斥其他邪神的教旨，在革命初期就曾率领群众捣毁庙宇偶像。他说：“皇上帝之外无神也，世间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皆后起也，人为也。”这都是些无用的蠹物。^⑥所以，他号召革命群众不要“以假作真”，迷信邪神，而要统统将其诛灭。通过破除迷信的革命活动，一方面扫荡了封建神权，另一方面也使革命群众解放了思想。当时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民歌这样写道：“打鼓求得雨，高山好开田；烧香保得佑，烧窑过大烟；食斋能得道，牛牯上西天；食烟食得饱，放屁好肥田。”^⑦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还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空前的批判。洪秀全把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圣先师”的孔丘列为邪神，指出“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⑧并将孔孟之道的经典——“四书”、“五经”定为“妖书”。太平军每到一处都砸孔庙，焚妖

①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诏旨》，中华书局出版，第32页。

②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诏旨》，中华书局出版，第33页。

③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卷一《诏旨》，中华书局出版，第33页。

④ 张德坚：《贼情汇编》，《太平天国资料》第3卷，第266页。

⑤ 《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印书》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15页。

⑥ 《太平诏书》、《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0页。

⑦ 转引自《太平天国诗歌浅谈》，中华书局出版，第30页。另参考《太平天国印书》下册，第794页。

⑧ 《太平诏书》、《太平天日》，见《太平天国印书》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8页。